



在剧本杀里，大大方方地谈论艾滋病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傅瑞
记者 秦珍子

22岁的任彦锡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走近”艾滋病。

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这名大学生和他的同学组成团队，以“防艾”为主题，创作“剧本杀”。

他们读书、谈论文、看纪录片、去医院调研观察、代入被感染者身份尝试购买病毒阻断药……基于真人、真事、真实处境塑造游戏角色，还原艾滋病患者的经历与感受。

“我共用了针头”“我烧到40摄氏度，看不清了”……与浏览海报、观看视频不同，参与剧本杀的玩家们要扮演角色，沉浸其中，在游戏时获取防治艾滋病的信息，理解艾滋病患者的处境。

2023年12月，第36个“世界艾滋病日”后，福州阳光学院学生团队原创的全国首个“防艾”剧本杀《七号病历》正式上线。发起并指导这次创作的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这种“受年轻人欢迎”的形式寄予厚望。

如今，对任彦锡和他的团队来说，“防艾”已经不单是那个早就完成的写作项目，更像一种“责任”。

“把年轻群体的疫情控制住了，对整个社会的疫情防控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张宏从来没有玩过剧本杀，这并不妨碍他知晓年轻人对这种游戏形式的热爱。这位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防艾科科长听说，“玩这个很有沉浸感”，他想，能不能创作剧本杀，对“玩家”科普艾滋病传播与防治的相关知识。

在他看来，“把年轻群体的疫情控制住了，对整个社会的疫情防控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此前，为了做防艾宣传，福州疾控中心试过很多形式，除了传统的“海报”“手册”和讲座，他们还推出名为“福小艾”的动漫形象IP、制作动画片、举办校园短视频大赛、在自媒体平台发布“抗艾日记”等。

“年轻人到底喜欢什么？”张宏和同事一直在研究，表情包、短视频都试过，还有没有更具“代入感”的方式？直到有一次，他无意间得知，“剧本杀现在挺火的”。

在这类游戏中，玩家拥有虚拟的身份和专属的故事，通过“角色扮演”经历他人的命运。张宏想，“或许可以让玩家体验艾滋病患者的人生”。

两年后，这个创意被一群年轻人落到了纸上。

2021年9月，22岁的任彦锡正在福州阳光学院广告学（直播方向）专业就读。平时，他会到一家剧本杀门店兼职，担任游戏的主持人，也会创作一些剧本。经店主介绍和正式的招投标流程，他“拿下”了创作“防艾剧本杀”的项目。

一支拥有7名大学生主创人员的团队迅速组建起来，牵头人之一是阳光学院教师苏广。

据这位老师介绍，参与创作的学生均是该校“写作研修班”的成员。他们来自不同院系、年级，都是写作的“忠实爱好者”。大家在“写作中学习写作”，写市场需求更大的“推文”“网帖”“剧本”，也写不功利的小说、诗歌、口述历史作品。

在“写作研修班”的编剧课上，苏广曾

实习生 张岳怡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秦珍子

每天晚上，魏娜都会听到右耳边传来噗噗的声音，像心跳一样，一下一下，不紧不慢。

发出声音的地方，是她大脑颞叶右侧的一个动静脉搏畸形团。正常情况下，血液从动脉流向静脉，中间会通过很多毛细血管稀释压力，但魏娜缺少那些毛细血管，动脉血直接涌向静脉，带来强大的冲击力。

噗噗声，是血液一次次撞击血管壁，每一次，都有可能造成脑出血。

魏娜大脑里有两个畸形团，另一个偏小的，在她右丘脑背侧，去年年初发生过一次破裂。

25岁的魏娜，确诊中风两年。

“已经做不到的事情就不要再想了”

中风即脑卒中，包括脑梗（缺血性脑卒中）和脑出血（出血性脑卒中），说得通俗些，就是脑血管由于各种原因破损或阻塞，使得血液不能正常流通。目前，脑卒中是中国居民第一位死亡原因，也是成年人残疾的首位病因。一般情况下，脑卒中主要发病于老年人。

令人遗憾的是，魏娜遭遇了大概率事件。她要面对的不仅是身体的病痛，还有突然转向的生活。不少和她遭遇相似的年轻人，需要和老年人躺在同一间病房里，日常里的禁忌事项比待做事更多。

一到天亮，魏娜睁开眼睛，脑中那个畸形团就会以一种更直观的方式宣示存在。它影响这个姑娘的视力，造成偏盲。在她的视野里，左下方总是一片漆黑。

魏娜学校门口有几个石墩子，正好在那片“漆黑”里，她常常在这里摔倒。不到一个月前，她摔得鞋子脱落、手机掉出口袋、浑身淤青。

魏娜不得不更加小心。人行道上的路障、绿化带里的灌木、教室左侧的桌椅，从左



《七号病历》剧本杀封面和6名患者角色的剧本分卷。

带着学生写过剧本。2021年，剧本杀市场火爆，苏广曾邀请一位作者来学校交流。后来，他听学生任彦锡说起了“防艾剧本杀”的项目。

传统的防艾宣传形式相对“泛化”，剧本杀则要求在每个角色身上还原大量真实的细节，呈现角色身处的时空与场景。具体说来，一份防艾手册能告诉读者病毒的传播方式和防治办法，而剧本杀则能让玩家代入一名艾滋病患者某一具体时刻具体的经历和感受。

苏广长期在高校工作，他了解到，发生在大学校园的艾滋病疫情不可忽视，然而在校园里谈论这种疾病，如今依然有某种“禁忌”的味道。

苏广是河南驻马店人，他家所在县城的隔壁是上蔡县，这让他对艾滋病有特殊的认识和理解。

上蔡县是秦代名相李斯的故里、中国重阳文化之乡，是联合国地名专家组认证的“千年古县”。20世纪90年代，当地文楼村村民有无偿献血，大量共用针头，造成艾滋病流行。几十年后的今天，村子的环境早已不同往昔。

苏广回忆，就在前两年，他的一名好友还因为听说文楼村的过去，放弃了当地一份待遇优厚的工作。这件事对他冲击很大。他再清楚不过，如今的文楼村发展很好，柏油马路宽阔，生态环境优美，更有免费的医药服务。但有些人受限于对艾滋病的认识，很难消除偏见。

苏广很早就知道艾滋病毒传播的途径，他反对给患者套上“道德”的枷锁，更反对歧视。“当年，贫困才是有无偿献血的根源。”苏广说，当他得知学生们要创作与防治艾滋病有关的剧本杀时，立即表示支持，期待带领他们的“有价值地”成长”。

“年轻人应该认识真实的世界”

近年来，我国艾滋病疫情整体处于低

流行水平。经输血和血制品传播已经实现了基本阻断，母婴传播和注射吸毒传播得到了有效控制，重点人群防艾意识不断提升，危险行为发生率不断下降，抗病毒治疗覆盖比例已经达到90%以上，治疗成功比例达到95%以上。公众不再“谈艾色变”，艾滋病话题的开放度更高，患者面对的医疗与社会环境更友好。

然而，“科普”与“反歧视”的任务还远未结束。

00后欧语嫣是《七号病历》的主创人员之一。她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讲述了身边发生的故事——一名同学瞒着女友与多个性伴侣发生关系，曾因高危性行为出现身体异常，怀疑自己感染艾滋病病毒，偷偷领取阻断药，却没有把实情告诉女友。欧语嫣小时候的一个朋友，确诊艾滋病后，隐私被泄露，全家迫于压力搬离原小区，就此“失联”。

在欧语嫣看来，无论有人“隐瞒实情”，还是有人“遭遇歧视”，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因为人们对艾滋病及患病群体的认识还不够，“我们创作这个剧本杀很有意义”。

现实的问题是，这个公益性质的项目稿酬微薄。

苏广介绍，阳光学院是福建省一流应用型建设高校，办学目标是让学生离校就业或企业的需求更近。“写作研修班”对接市场对优质文本的需要，也会组织写作诗歌、小说和非虚构的纪实作品。他们曾邀请福建文联主席来上课，讲座对外开放。

在接下“防艾剧本杀”项目的最初，这支团队就没有考虑报酬。在苏广看来，如果写作就以赚钱为目的，“都冲钱去，就会有各种麻烦和矛盾”。他希望学生少想盈利的东西，去做擅长、想做、感兴趣的内容，不要被钱扼杀创造力。

任彦锡领衔，同学们利用课余时间进行创作。这个题材相对敏感，对准确性、科

那个年轻人中风了

康。但同时，大约每100位卵圆孔未闭患者中会有一个突发脑梗，徐萱就是这百分之一。

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杜万良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年轻人脑卒中的主要原因是先天性因素，同时，高油高糖的饮食、熬夜、缺乏运动等不良生活方式也带来一定影响。在杜万良看来，脑卒中发病还没有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与其说发病提前了，不如说就诊提前了，健康意识提高了”。

杜万良介绍，全球疾病负担数据库（Global Burden of Disease，简称GBD）显示，1990—2019年，中国脑卒中发病率上升86%，死亡率上升32.2%，但脑卒中年龄标化发病率下降9.3%，年龄标化死亡率下降39.8%。脑卒中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上升主要反映了我国人口老龄化，脑卒中标化发病率和标化死亡率的下降则体现出人群健康状况的明显改善。

徐萱喜欢过山车、滑雪，一直想去试滑翔伞和漂流，但她以后大概率都不能玩了。“不能做极限运动那就看风景嘛。”她顿了顿，声音低了一点，加了一句，“已经做不到的事情就不要再想了”。

那缕红色不见了

徐萱记得，她住院期间，一天夜里，隔壁床的爷爷突发心脏衰竭，抢救了很久。他的子女们守在医院，整宿没有睡觉。这间病房的心电监测仪不时传出急促的滴滴声，门外走廊也摆满病床。

徐萱说办理住院时，护士长照顾她年龄小，腾出一个靠窗的床位。后来她去武汉做手术，医院专门安排权威的专家。“即使在每个医护都焦头烂额的新冠疫情期间，一个脑卒中的年轻人也被给予了最大程度

学性要求极高，苏广让学生“不许编”，要做到所有细节客观、真实，塑造角色要找到现实存在的案例，从有来源、能核实、真人真事里提炼症状、数据、感受。

一上手，师生们都意识到，艾滋病患者对他们来说，是个全然陌生的群体。苏广表示，很多资料来自纪录片，这些资料呈现的世界“超出剧本杀玩家的想象”，故事的分量足够重，要适当减轻冲击感。故事框架可以“开脑洞”，但“细节”不接受捏造。

收集资料花费了年轻人大量的时间。任彦锡看了近100部剧本杀文本来构思、确立故事框架；欧语嫣“看了（大家搜集来的）快200部视频，少说几十份期刊论文”。她还翻了更多关于艾滋病的网帖，“少说1500多条吧”。

在一些隐去身份的陈述里，欧语嫣看到，有人刚刚确诊，意志消沉；有人炫耀高危行为后未被感染的“幸运”；有儿子坦白“报复”父亲曾经严厉的教育方式；有老人感染后叠加重病，心态崩溃折磨子女。

欧语嫣看到的世界验证了苏广此前的顾虑，作为老师，他支持学生面对真实，又怕他们被负面事件和情绪影响。

有一次，任彦锡为了体会剧本杀角色的情感逻辑，凌晨3点到处求购艾滋病病毒阻断药，还一大早到医院排队——“医生开处方的动作很快”，门口就能自费拿药。他还是感受了5个半小时的“焦虑”。欧语嫣也来到医院，近距离地观察艾滋病患者。

10月的福州，天气还比较炎热，有些患者穿着连帽卫衣，戴口罩、墨镜、手套，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有的看上脸色不太好，像是正在经历严重的症状。

这家医院的艾滋病诊室和其他诊室连在一起，欧语嫣观察到，有人在路过艾滋病候诊区时，把孩子往身边拽。有孩子在候诊区方向多看两眼，随即被家人要求“不要看”。

的关照。”徐萱说。

那是去年1月7日凌晨，她突然摔倒，怎么也爬不起来，有一瞬间，她怀疑自己中风了，但心底并不相信，直到诊断结果显示脑梗。

然而，徐萱错过了“溶栓”的6小时黄金时间。她是年轻人，半小时后就能站起来，病症也不严重，连医生都没考虑脑梗的可能——大多数时候，一个年轻人突然晕倒，很少会被和中风关联起来。

去年春节，魏娜住在男友位于北京的出租屋里。一次去取快递时，她肩膀突然止不住地哆嗦，双脚好像踩进棉花里，呼吸越来越艰难，“脑子”“滋”了一下。她以为自己低血糖，回家吞了一口水。

魏娜给男友打电话，想联系房东叫120。男友迟疑了，“担心房东多想，不愿意出租房子了”。她更愿意相信这只是一次普通的贫血。可魏娜已经瘫在地上，天旋地转，全身发麻。因为“害怕死在房子里，房东来了打不开门”，她撑着一口气手脚并用爬到门口把门打开。

那天在医院，血液化验结果一切正常，症状减轻，魏娜回家了。两个月后，她眼睛畏光，眼球布满血丝，便再次来到医院。医生说，不是眼睛的问题，然后指了指脑袋说：“是这里的问题”。

“这不属于我。”魏娜想。她记得确诊脑卒中那天，在医院影像科门口，一位显然“久病成医”的老人对着她的片子说：“一看问题就严重”。

魏娜不相信那团“这么大的东西”出现在自己的脑袋里。离开医院时，她连马路上的嘈杂声也听不到了。

29岁的李亚正在重新学习走路和抓握。脑卒中使她偏瘫，她的左半边身体肢体功能几乎完全退化。



任彦锡（图中站立者）和团队成员正在对《七号病历》剧本杀进行测试。



任彦锡（左）在和团队成员讨论剧情。

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欧语嫣对山西临汾红丝带学校的故事印象深刻。曾经，学校里有个小男孩，父母因有偿献血感染，他遭遇“母婴传播”。村里有203人写联名信让他离开，信上甚至有他祖父的签名。

欧语嫣说，她从前只是认为宣传“防艾”是正确的事情，在看到“小路”的故事之后，她感到“使命感”和“信念感”。艾滋病患者小路的故事出自20世纪初的一部新闻纪实片，小路是我国第一位面对镜头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他原名卢鼎盛，因患病艰难求生，希望借助社会大众的力量活下去。

如今，欧语嫣能脱口而出小路的一段自白：“但我我是这条路上的一条枕木就够了，让未来防范艾滋病的列车从我身上碾过，铁轨是你们媒体……火车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国务院原有组成部门，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车厢是每个医疗机构，我愿意做一条枕木”。

真实案例反复触动着创作剧本杀的年轻人。比如，原来，附近的居民对红丝带学校避之不及，但随着观念的改变，人们不再再害怕。

有网帖讲述，缉毒警察在抓捕行动中携带病毒的嫌疑咬伤、刺伤，不幸感染，他们值得被尊敬和守护。欧语嫣和她的同学认为，让患者得到基本的理解和尊重，这件事很有必要做，也要让更多人了解科学的防护和诊疗手段。

两年来，主创团队有人离开，有人加入，在大纲推翻重来4次、六七万字的文本彻底重写过一遍之后，《七号病历》终于完成了。每名角色都代表着艾滋病传播的一种途径，故事框架建立在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发展进程之上。创作团队反复核实内容，确保细节的准

确度和真实性。

在游戏的结尾，他写下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由疾控中心专业人士审了两三遍、又由北京的专家再一审一遍之后，2023年12月，剧本杀《七号病历》举行发布会，正式上线。

这是一个推理故事，6个人醒来后失忆，一名医生帮助他们回忆往事。为了模拟艾滋病病毒阻断药副作用可能带来的晕眩、恶心想吐，任彦锡特意把故事发生的场景设置成风浪中的大船。通过“追寻身世”，玩家以角色身份经历艾滋病传播的过程，回顾创作过程，任彦锡表示，每个人物的故事背景都写了一万字，连串联游戏的医生都有一份近5000字的“人物自传”。

剧本杀制作完成后，创作小组在校园里招募了志愿者来参与“内测”。有的同学批评剧本的游戏性不够完整，也有同学表示深受感动，称赞剧本情感细腻，文笔好得可以“拿去评奖”。

作为团队核心，任彦锡以年轻人的视角估计——宣传防治艾滋病，短视频可能被划走，长视频没耐心看完，宣传册不爱看，剧本杀倒是有可能玩一玩。一场剧本杀的时间一般在4个小时以上，玩家有足够的体验剧情里的一切。

张宏介绍，福州疾控中心不光关注年轻人。老年群体中，不少科学知识有限，防护意识薄弱，抗拒检测。在国内老年艾滋病病例数字上升的趋势下，福州疾控中心以受老年人欢迎的文艺风格、传播方式开发作品，通过短视频平台转发、传唱、评优、推广。

2019年，福州市被确定为第四轮全国艾滋病防治示范区。2023年，福州市第五轮全国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工作启动之年，“福小艾”防艾宣传品牌、“1+1+N”防艾队伍和“艾益区”智能防艾平台等创新模式入选全国示范区优秀经验模式。

在世界范围内，针对艾滋病患者，越来越多的新药、疗法被开发出来，在中国，更多药物加入医保。艾滋病病毒载量低于1000拷贝，即被认为“治疗成功”。

“未经科学治疗的病人可能会达到几十万拷贝，这样的患者免疫水平就很低。”张宏说，“如果低于1000拷贝，基本算是检测不到的水平，免疫系统也会慢慢恢复正常。（艾滋病患者的）寿命和正常人也差不多了。”在他看来，像对待常人一样对待艾滋病患者的同时，也要用平常的态度对待艾滋病的话题。

“剧本杀最大的好处在于，它可以让一个玩家大声讲出来原本说不出口的事情。”任彦锡说，“把这些事放到台面上，用另外一个身份去讲出来，去直面客观存在的现实”。

他解释，自己不想冒犯任何群体，只想让人们大大方方地去谈论。在这个年轻人看来，国内民众对性还有一种羞耻感，他自己受到的性教育就是遮遮掩掩。性传播的疾病不光有艾滋病，但这两个病的痛感最强，来自一种“刻板印象”，一种对“性”的难以启齿。任彦锡认为，如果“性”没法被大张旗鼓地讨论，那么性教育课就无法开展，如果社会对艾滋病患者的刻板印象不扭转，更广泛的病毒检测就无法推广。

截至发稿前，任彦锡和他的同学已经针对剧本杀经营机构发出32册剧本，其中一本发往马来西亚。收到剧本后，经营者通常会向创作者索要游戏手册；创作者则会通过提问，验证经营者有没有认真阅读剧本。

“如果是个很一般的问题，店家只会敷衍一下。”任彦锡认真思考后，把一个只会藏在剧本的结尾，“游戏结束时，主持人要能清楚地告诉玩家，离本店最近的艾滋病病毒阻断药取药地点在哪里。”——这便是任彦锡设计的问题，在他看来，它比游戏好不好玩更重要。

在急诊病人多的情况下，绿色通道能大大减少时间延误，提高治疗效果，减少残疾和死亡。

李亚是在漫长的治疗过程中，建立了对这种疾病的认识。

“发病前那两年，是我人生中最好的日子。”她说，有闲又有点小钱，足够不时和朋友出门小聚。

患病一年来，她常忍不住翻看过去的照片，看自己当时修长的腿和苗条的身材。生病以后她胖了10斤，肌肉不再紧实，艰难支撑着躯体复健。

李亚花一个月重新学会了洗袜子——用正常的手搓揉，左手拿袜子——这简单的两步包含了抓、握、举、捏、提以及双手配合等复杂动作。在练走路和洗袜子的同时，她也会学了接受现实。

刚确诊时，医生和护士都告诉她，“几个月就好了”，或者“你这么年轻，恢复很快的”。很久以后，她才意识到“不可能像以前一样了”，无法回到过去，是魏娜、徐萱和李亚正在面临的现实。

确诊后，魏娜还需要在3种治疗方式中作出选择：放疗伽玛刀、微创介入和开颅手术，每一种都有风险，也有优劣。在接受记者视频采访时，她反复确认“可以开‘美颜’”，认真化了妆，“我不要太难看”。

魏娜记得，有次在天坛医院，她看到一个小孩，头上顶着很大的疤，她感觉全国各地来的人都在那儿，抢着挂“几百元钱的号”。

现在，在她的大脑内，小的畸形团通过介入治疗方法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大的畸形团还没有治疗，它靠近颞叶，在运动区，手术难度大，一旦出血很可能会影响肢体，造成偏瘫。

魏娜说，顶着一颗“炸弹”，“活着变成一件运气的事”。

幸运或不幸有时是相对的，她同样记得，有一次医生说：“你能活到现在读研究生已经很幸运了。”有的小孩出生两个月就因为这个病去世了。”

（为保护受访患者隐私，文中魏娜、徐萱、李亚为化名）